



安德烈·马尔罗(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

安德烈·马尔罗是一位驰名全球的传奇人物。2026年是他逝世50周年。新年伊始,法国文化部正式启动“2026马尔罗年”,通过在全国举办的130多项活动,展现这位富有远见的文化智者的方方面面。首先,作为揭幕活动,勒阿弗尔市推出安德烈·马尔罗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马尔罗与现代艺术大展》。一系列追念马尔罗的国际文化活动也已启幕。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兰西之家”围绕“马尔罗与担当”主题,举办盛大的文化活动,表明马尔罗不仅是当代法国文豪,更是一位光扬世界文化遗产的弄潮者。

当然,马尔罗首先是一位20世纪的人文主义作家。上世纪80年代,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任职时,受国内《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委托,特约龚古尔文



安德烈·马尔罗图书馆

天涯异草

传奇马尔罗:从文坛骑士到文化先行者

□沈大力

学院院士罗布莱斯写一篇文章关于马尔罗与中国的文章,由我译成中文在中国刊物上发表。罗布莱斯的文章题为《马尔罗,中国革命的预言家》。罗氏开篇谈及他已于1935年读了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境遇》,“心中燃起一团火,渴求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于是,他自马赛港乘船前往海防,再奔到云南府(今昆明),欲由彼进入中央苏区,观看“另一种生活境遇”。

事实上,众多像罗布莱斯这样的年轻人,受到马尔罗小说的感召,产生了热烈的“中国情结”。法国作家兼记者彼埃尔·



马尔罗纪念邮票

古赫塔德在自己的小说《红场》里,描写法国当时青少年的思想状态,说:“《人类的境遇》中一些话,成了这些青年人在生命的悲剧性时刻获得启迪的箴言。”有人受这部作品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近日,在中国执教多年的法国专家梅涛也向我证实,《人类的境遇》当年确于法兰西文坛别开生面,与传统小说决裂,在一泓水中掀起激浪,读者反应强烈,社会效应深广,实可谓一个“奇迹”。

谈到马尔罗本人,他自1924年公开痛斥法国殖民主义政策。翌年八月,他风闻中国内地的动荡,于1928年发表《征服者》。这是马尔罗第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虽然情节是虚构的,表达的是作者个人革命浪漫主义的哲思,但向世界传递出法国社会革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在东方古国的回响,引起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关注。

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尔罗1931年创作的小说《人类的境遇》,于当年12月7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并入选法国中学课本。该书起初流传的中译名是《人类的命运》,其实,作者在此书意指人类生活的环境,而非预卜一种命相。

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马尔罗宣称:“我唯一系于心的,就是表达人类的崇高意向。我在生活中曾遇到过一些遭受镇压、被迫害的中国共产党人,我正是

为这些牺牲者而写作的。至于那些将欲望置于崇高之上的人,还是让他们远离这部书,因为,此书并不是为他们撰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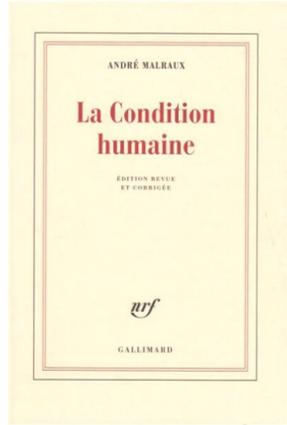
1937年12月,马尔罗发表小说《希望》,正当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在特鲁埃尔战役失利之时,几乎跟伊文斯和海明威二人合作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一同问世。这部小说与《人类的境遇》不同,内容完全是作者亲身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具有冒险气质的马尔罗闻讯前往,主导成立了有五十多个国家三万多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马尔罗自己充当飞行驾驶员,执行过多次任务,还在战斗中受过伤。阿拉贡曾这样评论这本书:“《希望》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一本让我们最崇高的理想直面最为紧迫现实的作品。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相比拟!”

1942年,马尔罗加入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运动”,一度被德军逮捕关押。经法国抵抗运动武装营救出狱后,他领导了阿尔萨斯-洛林游击队,并结识了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视他为挚友,在其《希望回忆录》一书中赞扬道:“在辩论中遇到重大命题,他明晰的见解总能帮我驱散阴影。”巴黎解放后,马尔罗于1945年11月被任命为新闻部长,后转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69年4月戴高乐隐退,他随之辞去政府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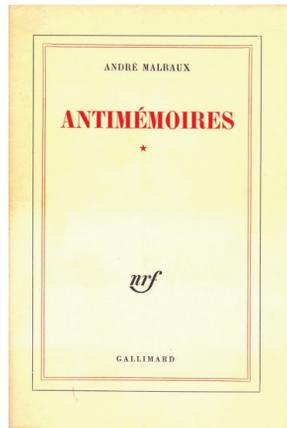
马尔罗本人也颇像一位“文坛骑士”,他一生著作颇丰,除上述《征服者》《人类的境遇》《希望》外,还有《纸月亮》《西方的诱惑》《王家大道》《可鄙的时代》《艺术创造》《阿尔腾堡的胡桃树》《沉默的声音》《神祇的变态》和晚年的《逆反回忆录》。其中,我最关注的是《西方的诱惑》。法国作家克洛德·普兰特别向我推荐这本书。在这部比较文学著作里,马尔罗通过一个旅法华人和一个到中国的法国漫游者之间的书信对话,表现西方文化与中国知识界的张力,他写道:“西方精神始终力求赋予其所珍视的事物以永恒的特性,其中蕴含着一种征服时间、使时间成为形式囚徒的尝试。”他接着又说:“欧洲这座大墓地,只有征服者长眠于此。由于炫耀自己显赫的声名,而越来越悲伤。忍受孤寂的老兄,你留给我的只有一片荒芜的地平线和绝望的反照。”在此,作者发出的是否为现今所谓“西方衰落”的先声,亦未可知。诸事难以具

论,但马尔罗却表露了自己并不赞同西方文明优越论,而趋向于探寻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一个西方人秉持这种观念,实为难能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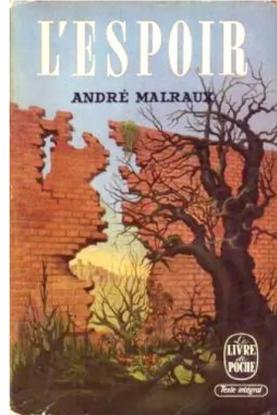
马尔罗是一位知识渊博、辛勤耕耘的艺术史家,他最早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倡导多元文化,突出“艺术在人类命运中的关键地位”。在他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期间,马尔罗努力保护法国文化



《人类的境遇》



《逆反回忆录》



《希望》



《想象艺术馆》

临各类艺术博物馆一般,浸润在艺术世界之中。

1978年初,我在巴黎大歌剧院观看芭蕾舞,从座位上抬头仰视歌剧院大厅的彩绘天花板,圆顶上面画有《天鹅湖》《火鸟》和《魔笛》等舞剧的图案。听一起观剧的法国朋友介绍,这是夏加尔应马尔罗之请,特意绘制的作品。实际上,夏加尔这位白俄罗斯血统的画家,在法国受到了文化部部长马尔罗的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异邦发挥他的绘画才华。可见,马尔罗对艺术家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对艺术创作的指导到了多么具体的程度,令众人难以忘怀。

值此法国马尔罗年,法国民众一齐追怀马尔罗对社会文化的贡献,伽里玛尔、弗拉马里翁和格拉塞等各大出版社纷纷重版他的大量文学著作和艺术研究。巴黎“马尔罗之家”扩大开放,各大传媒组织多种学术辩论会以及文娱演出,特别号召重读他的诸多文学作品。值此马尔罗年,重温这位文化先行者的足迹,不仅是对一位文豪的追念,更是对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致敬。

遗产,尤其注意让文化惠及全民。

马尔罗早年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梵文和汉语,对东方艺术和亚洲历史文化兴趣甚浓。为此,他很早就携妻子克拉拉踏上柬埔寨的土地,直奔高棉密林中的吴哥窟,收集大量东方文化资料进行研究。之后,他驾飞机到非洲,找寻萨巴女王遗址。他不停地漫游世界,从中亚至北非,再到南美,踏遍世界各个艺术圣地,深层探究艺术的广度和奥秘,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观,从而创立了以影视为传播形式的“想象艺术馆”。这一新颖的文化艺术模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在巴黎期间看到他出镜拍摄的系列艺术纪录片,仿佛亲

电影《伊甸》:

极具野心的叙事,遗憾的完成度

□李雪涛

我用了几个傍晚的时间将《伊甸》(Eden, 2024)看完。这是一部很有野心的影片,但也很危险——危险在于主题比完成度更“野”。这部电影抓住了一个极具思想张力的历史切片:逃离文明、拒绝现代性、在“自然伊甸园”中重塑自我。影片中,弗里德里希·里特医生(Dr. Friedrich Ritter)和多拉·施特劳赫(Dore Strauch)并不是简单的“隐士”,而是带着启蒙理性的道德乌托邦的实验者。电影一开始把他们塑造成“反现代”的理性狂热者,这一点很到位——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理性走到极端后的反讽。

但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影片很快把冲突推向“人性堕落”“权力争夺”“嫉妒与暴力”,尤其在“女男爵”登场之后,叙事明显转向通俗惊悚与悬疑。结果是乌托邦的思想实验被情节化、戏剧化,人与自然、理念与身体、理性与控制的深层张力没有被持续追问。因此这更像是一出“文明人到了荒岛也一样互相毁灭”的寓言,而让影片在哲学上显得不够深入。

如果从思想角度看,它本可以更尖锐。里特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尼采式的自我锻造,生命哲学对“文明衰败”的反感,一种带有权威性、禁欲性、男性中心的“自然理性”等等,但电影最终并没有深挖这种“反文明的文明性”,而是用冲突不断升级来替代思想推进。

因此,在我看来作为一部“文明批判题材电影”,它立意高于完成度,而作为历史改编,它选

择了戏剧性而牺牲了思想复杂性。再有就是,作为观影体验,它紧张、有气氛,但余味不够悠长。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伊甸》拍出的仅仅是逃离文明的冲动,而没有真正走到“为什么这种逃离必然失败”的思想深处。

《伊甸》里那对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走向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德国人,背后拖着的并不只是行李,而是整个欧洲近代精神史的一段长影。岛屿只是舞台,真正的剧情,发生在思想里。德国思想传统中始终潜伏着一种“反文明冲动”。它并不粗鲁,也不反智,恰恰相反,它往往诞生于高度自觉的文明内部。浪漫主义时代,这种冲动首先是一种温和的抗议:当理性变得冷硬,当制度吞噬了感受,人便试图回到自然,寻找整体与和谐。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画中的孤独身影,仁立在雾海之上,并不是逃亡者,而是沉思者。自然在那时,是精神的回声室。

但这种回声,慢慢变了调。到了19世纪末,反文明不再满足于审美的退隐,而开始要求重塑生活本身。生命哲学把自然理解为力量、本能与意志,文明则被视为衰败、驯化与虚伪。于是,“回到自然”不再只是内心的姿态,而变成了一种需要被执行、被管理、被坚持的计划。身体开始被训练,饮食被规范,性被道德化,孤独被当作净化。自然,悄然成了一种需要秩序来维持的状态。

20世纪初的德国,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实



华德作品,2025年8月在中国上映

践。生活改革运动、素食主义、自然疗法、裸体主义、共同体实验——思想走出了书房,住进了现实。人们相信,只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就能摆脱文明的病症。于是,山谷、疗养院、孤岛,成了新的实验室。

《伊甸》所讲述的故事,正是这一传统的极端分支。那位医生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怪人,他几乎是这一思想谱系的逻辑终点:理性、禁欲、身体实验、对“堕落文明人”的蔑视,以及对他人生活方式的绝对判断权。他并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压缩、提纯,带到一个再也无法逃离的地方。

我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反文明一旦需要制度来维持,它就不再是反文明。孤岛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权力密度极高的空间。越是宣称纯粹,越需要排斥;越是强调自然,越依赖控制。于是,乌托邦开始显露它的另一面:道德审判、等级秩序、暴力的合理化。最终,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逃离文明,只是进入了一种更封闭、更尖锐的文明形态。

《伊甸》并不是在讲“人性本恶”,它真正触及的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反文明的冲动,总是以另一种文明的形式回归?答案或许并不在道德,而在结构。因为反文明从来不是现代



《伊甸》海报

性的外部,它是现代性的一次次自我校正、一次次过度用力的修正。它想用更纯粹的理性来纠正文明,却往往制造出更极端的文明问题。

因此,逃离文明并不一定通向自由。有时,它只是把文明带到了尽头。这或许正是《伊甸》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最远离世界的岛屿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个熟悉的欧洲精神——只是少了缓冲,多了锋利。

如果说浪漫主义的反文明是一声叹息,那么20世纪的反文明,往往是一场实验。而实验失败时,留下的不是诗意,而是废墟。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